

中國文學研究典籍叢刊

汪辟疆 撰 王培軍 箋證

光宣詩壇點將錄箋證

上

中華書局

中國文學研究典籍叢刊

光宣詩壇點將錄箋證

上冊

汪辟疆 撰
王培軍 箋證

中華書局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光宣詩壇點將錄箋證/汪辟疆撰;王培軍箋證。-北京:
中華書局,2008.9

(中國文學研究典籍叢刊)

ISBN 978-7-101-06256-4

I.光… II.①汪…②王… III.古典詩歌-文學研究-中國-清代 IV.I207.2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8)第 116773 號

責任編輯:俞國林

中國文學研究典籍叢刊
光宣詩壇點將錄箋證

(全二冊)

汪辟疆 撰

王培軍 箋證

*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(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zhbc@zhbc.com.cn

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1/32·29 1/4 印張·4 插頁·650 千字

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數:1-3000 冊 定價:76.00 元

ISBN 978-7-101-06256-4

《中國文學研究典籍叢刊》出版說明

中國古代學者對文學的認識、思考、研究和總結，是以多種形式書寫、流傳並發生影響的，有的是理論性的專著，有的是隨筆式的評論，有的是作品前後的序跋，有的是作品之中的評點。這些典籍數量豐富，種類衆多，涉及各個時期的不同的文學現象和文學思潮，以及不同的作家作品和文體文類。對這些典籍文獻的收集、整理，在近百年來，一直是學術界著力的重點，取得了很大的成績。

爲了進一步推動這一工作的進展，我們組織了《中國文學研究典籍叢刊》，選擇歷代具有代表性的、比較重要的典籍，採用所能得到的善本，進行深入的整理。因各類典籍情況差異較大，整理的方式也因書而異，不求一律，或校勘，或標點，或注釋，或輯佚，詳見各書的前言與凡例。《叢刊》的目的，是系統地爲學術界提供一套承載著中國古代學者文學研究成果的，內容更爲準確、使用更爲方便的基礎資料。我們熱切地期待學術界的同仁們參與這一澤惠學林的工作，並誠摯地歡迎讀者對我們的工作提出批評指正。

中華書局編輯部

二〇〇六年六月

劉序

詩壇點將錄之作，清詩人鐵雲舒氏所創也。其源蓋出自前代之《東林點將錄》，而化宦海黨爭之具，爲詞場評騭之資，猶演兵事而爲行棋，善哉，其誰曰不可哉？而談藝論文，自此遂別開一體。其取《水滸》渠魁以配當日詩流，雖遊戲之舉，實比擬之道也。以比擬爲人倫，古人蓋有之矣。傳曰：「子貢方人。」方者比擬也。端木氏比擬之詳，今不可得而知矣。忖度之，想亦以人方人，不出「似之耶、不類耶、勝之耶、不如耶」四者範圍耳。此以同類爲比擬者也。比擬之用，取之以寓彰瘴也。

亦有以異類爲比擬者焉，其旨亦猶是也。古人月旦之辭多喜爲之，如鍾仲偉《詩品》之「謝詩如芙蓉出水，顏詩如錯彩鏤金」，「范詩清便宛轉，如流風迴雪」；丘詩點綴暎媚，似落花依草」。方於物矣，而未方於人。袁千里評書，則善以人方，如：「王右軍如謝家子弟，縱復不端正者，爽爽有一種風氣。」羊欣書如大家婢爲夫人，雖處其位，而舉止羞澀，終不似真。」後世如張芸叟「梅聖俞如深山道人，草衣木食，王公大人見之，不覺屈膝」之句，敖器之「魏武帝如幽燕老將，氣韻沈雄」；曹子建如三河少年，風流自賞」之言，皆紹其所爲也。然僉泛泛而比，未徑以今之某人擬諸古之某

人也。爲之，則自《東林點將錄》始。且採之小說，擬取其似，人逾於百，此誠前世所無者，甚矣小人之善創也。瓶水之《錄》，師其造意則爲沿，用之詩壇可謂創。近世汪氏辟疆效而作《光宣詩壇點將錄》，錢公仲聯更繼而作《近百年詩壇點將錄》，沿其形而寓其創，諸談言微中處，亦每足令人領首而笑也。今湖海之士亦有慕而廣揚者，茲體之沿誠未有已也。

弟子王培軍好讀近世詩，欲取汪《錄》而箋注之，以爲博士學位論文。訪之於余，余告之曰：

「觀諸公點將之錄，雖若弄狡獪然，而彼時以詩鳴者固歷歷然矣，其可忽乎哉！顧余於此蓋有不愜於心者數焉：

「擬於不倫，一也。夫梁山，揭竿以抗朝廷者也，故有部伍焉，有上下焉。以之擬東林猶可，黨人間固有綱紀部勒存焉。而詩人則猶散仙然，縱並世而居，固不相統屬也。指某人爲宋江矣，爲盧俊義矣，其能以金鼓指揮諸詩人之進退耶？舒《錄》以袁簡齋爲及時雨，以其聲氣之盛，猶殆庶幾；汪《錄》以陳散原爲宋江，學其詩者幾何耶？陳石遺固已先我而言之矣。

「擬之之道非一，二也。即以汪《錄》言之，有以等第擬之者，如以詩壇都頭領天魁、天罡二星之擬陳伯嚴、鄭蘇堪是也，此猶可謂據詩之品第而定，餘則大不然矣，率取其自以爲似者而擬之耳。細繹之：有以諱名擬者，如以喪門神之配譚壯飛，鐵叫子之配憚薇孫是也。有以姓氏擬者，如黃信之比黃晦聞，劉唐之比劉斐村是也。有揣其身份者矣，如李梅盒爲道士，則配以公孫勝；寶竹坡爲宗室，則配以柴進是也。有以所操之業擬之者矣，如安道全之比王聘三，朱富之比張楞嚴是也。有

以形貌擬之者矣，如美髯公朱仝之比梁節庵，白面郎君之比吳董卿是也。有以性情行止擬之者矣，如天速星之比康南海，王英之比廉惠卿是也。詩人有兄弟二人者，則每擬之以兄弟，如以解珍、解寶之配程伯翰、程子大，蔡福、蔡慶之配方地山、方澤山是也。苟不論詩而論人，以吹毛索瘢之心而務求其似，何處不可得「將無同」三字耶？縱肖矣、類矣、似矣，然則果何與於詩耶？果何與於詩藝之高下優劣耶？

「持門戶之見，快恩仇之報，褒貶隨心，三也。如汪《錄》以江西體爲尊，非公論也，言之者衆矣，如余則寧讀樊山、實甫耳。又如石遺，同光體之詩論家也，其時亦無足與並立者，而汪氏憎之，乃貶之爲地煞星中之朱武，人多以爲過也。其上散原而次弢庵，人亦有非之者。至其所甚惡者，則儕諸地賊、地狗、地耗之列。不特此也，汪氏且阿私友朋而自亂其例，程穆庵、胡翔冬輩民國詩人竟皆闖入其間。嘻，亦甚矣哉！」

「之數弊者，皆其體之先天不足，作者之予智自雄有以致之。後之踵爲者，亦難以免乎此也。雖然，爲錄者固熟諗當日之詩壇，而爲我詳列諸詩人之名氏矣。其中頗有遺集無傳、諸史不載者，賴以存其姓字。此吾之所以猶許其不可忽者也。且所記軼事，可備掌故。其評品雖未必公，亦可備一家言。既爲一家言矣，則必善弊兩存。吾子欲爲之箋，必留其善而去其弊而後可。舒《錄》已去《東林錄》蛇蝎之毒矣，君能藥方湖氏自聖之顛乎？」

培軍不以爲忤，乃下帷苦讀冥搜，傾全力以注其《錄》，三年而書成。余覽之，喜其條例之善、

注釋之精：汪氏所筆則究其出處，如是則沿創分矣；他人之說則取以糾偏，如是則平允得矣；簡略之處則補之以詳，如是則幽隱顯矣。汪氏則存其獨見之異，讀者則獲其兼聽之明，光宣詩壇，如視諸掌矣。茲《錄》之增光加價，皆吾培軍之力也，猶裴松之之於《三國志》、劉孝標之於《世說新語》矣。辟疆而服善，地下有靈，吾知其必許爲後世子雲，肅衣冠而拜之也。

戊子三月龍游劉永翔序於海上之蓬遠樓

前言

一

在近代詩學研究中，汪辟疆（一八八七—一九六六）有較多的貢獻，他曾發表《近代詩派與地域》等重要論文，尤其撰寫一部《光宣詩壇點將錄》，把晚清光宣以來的詩史作了簡明勾畫。汪辟疆與老派詩人不同，並不厚古薄今，相反，他對近代詩有很高的評價^{（一）}。當然，他同時代的詩人或學者，如曹震、胡先驥、錢仲聯等，於近代詩也有較真切的認識。如曹震就說：「並世詩人，突過乾嘉。」^{（二）}時代稍晚的胡先驥，在《四十年來北京之舊詩人》中說：「晚清末季，詩學甚為發達，大家名家輩出。」又謂清末之詩，「遠邁康雍、乾嘉」^{（三）}。這些都是大膽的議論。

而在這些肯定的批評中，汪辟疆最具史家的自覺，其《近代詩派與地域》開篇即云：「晚清道咸以後，為世局轉變一大關鍵，史家有斷為近代者。本文論詩，標題曰近代詩者，非惟沿史家通例，亦以有清一代詩學，至道咸始極其變，至同光乃極其盛。」^{（四）}斷言清一代之詩，以同光間為最高^{（五）}。又云：「詩至道咸而遽變，其變也既與時代為因緣，然同光之初，海宇承平，而西陲之功未

竟，大局粗定，而外侮之患方殷，文士詩人，痛定思痛，播諸聲詩，非惟難返乾嘉，抑且逾於道咸。（中略）在此五十年中，士之懷才遇與不遇者，發諸歌詠，憫時念亂，旨遠辭文，如陳寶琛、張之洞、袁昶、范當世、沈曾植、陳三立諸人之所爲者，淵淵乎質有其文，海內承風，蔚爲極盛。」〔六〕并暢論其爲宋詩所不逮的四事：

宋詩承三唐之後，力破餘地，務爲新巧，大家如東坡、臨川，亦復時弄狡獪，以求屬對之工，使事之巧，如鴨綠鵝黃、青州從事、烏有先生之倫，已肇其端。南宋諸賢，迭相祖述，益趨新巧。近代諸家，雖嘗問途宋人，然使事但求雅切，屬對祇取渾成。其異一也。詩歌以蘊蓄爲極致。漢魏如北海、曹瞞，微傷勁直，然雄厚足以救之；唐如昌黎、香山，亦嫌太盡，然韻味足以救之。兩宋詩家，力求意境之高，終鮮洄游之致，才高體大，如坡公、山谷、放翁、誠齋，頗有譏其太放太盡之病。臨川早年意氣自許，晚年始造深婉不迫之境，則其他諸家傷於直率，更未能免。近代詩家雖嘗學宋，然力懲刻露，有惘惘不甘之情，故調高而思深，言近而旨遠。其異二也。晚唐詩家，極研聲律，一篇之內，音節諧美。宋人病其擘緩，救以古調，專事拗掇，其運古入律者，往往古律不分。山谷、師川，以力避諧熟之故，間爲此體，末流所屆，逮於餘杭二趙、上饒二泉、江湖末派之倫，鉤章棘句，至不可讀，則力求生澀之過也。近代諸家，審音辨律，斟酌唐宋之間，具抑揚頓挫之能，有諧鬯不迫之趣。其異三也。其尤有進於是者：詩歌一道，原本性情，似與學術了不相涉，才高意廣與夫習聞西方詩歌界義者，尤樂道之；咸主詩闡性情，無資於

學。然杜陵一老，卓然爲百代所宗，彼固嘗言「讀書破萬卷，下筆如有神」，又云「熟精《文選》理」。昌黎亦言「餘事作詩人」。是詩固未嘗與學術相離也。兩宋詩家，承三唐聲律極盛之後，獨出手眼，別開面貌，其精思健筆，洵足驚人！然爾時作者，惜多不學；荆公《字說》，騰笑千古；東坡經學，尤甚粗疏；宛陵但汲流於樂府；後山祇丐馥於杜陵。新安泛濫六經百氏，然天縱餘事，時落理障；永嘉抗志內聖外王，然經籍鎔液，終鮮變化。他如永嘉四靈，江湖末派，散精力於五言，窮物態於七字，空疏婬陋，更無論矣。近代詩家，承乾嘉學術鼎盛之後，流風未泯，師承所在，學貴專門，偶出緒餘，從事吟詠，莫不鎔鑄經史，貫穿百家。故淹通經學，則有巢經、默深；精研許書，則有饒訖、匹園；擅長史地，則有春海、寐叟；通達治理，則有湘鄉、南皮；殫精簿錄，則有郎亭、東洲。其專爲《騷》《選》《盛唐》，如湘綺、陶堂、白香、越縵、南海、餘杭諸家，亦皆學術湛深，牢籠百氏，詩雖與宋殊途，要足與學相儷，則又兩宋諸詩家所未逮也〔七〕。

我們據此一節論說，認爲汪辟疆以清詩勝宋詩，應該是没有問題的。而認真說來，汪辟疆所舉四事，除最後一條即「資於學」外，其他未必均能爲人首肯。譬如用事、屬對，晚清的樊增祥、易順鼎，便是公認的大家，他們把傳統詩的用事、屬對技巧，發展到前無古人的境界。又如言及聲律，同光間諸詩人，也並非「諧暢不迫」，即以胡朝梁爲例，其詩便專學黃庭堅的拗體，音節幾無任何諧美可言〔八〕；再如陳三立的多數詩，音調也偏於啞，屬於陳衍所說的「祝敵之音」〔九〕，算不得「抑揚頓

挫」。但是，不管此說應否修正，及所舉理由是否足據，汪辟疆於晚清詩的「大判斷」，是確具有詩史的絕大眼光的。

二

在中國傳統的著述中，幾乎所有正經著述，都具有極謹嚴的形式，尤以史家論著爲然。汪辟疆自是深明此義的。他在四十年代中後期，曾供職於國史館，與柳詒徵等同編《國史館館刊》，並撰寫多篇近人傳狀。所以，他雖以集部之學名世，而史學修養也頗湛深，自能運用史家的著述體式，那麼，何以他又於撰寫晚清詩史時，採用「點將錄」這一非正式體裁？或者說，他所撰寫的《光宣詩壇點將錄》，是否仍爲一時游戲之作，不得與於「詩史著述」之林？

考察「點將錄」的淵源，毫無疑義，應追溯至明代《東林點將錄》。據《明史》卷三〇六《閹黨傳》，明末閹黨中的王紹徽^(一)，爲排擊東林黨人，曾戲仿《水滸傳》「英雄榜」，編排了一百零八名東林黨人，撰成一部《東林點將錄》，獻給魏忠賢按名黜汰。其實質，則爲「黑名单」。自然，如其僅爲「名單」，便很難引起後世文人的雅興，或許也早已亡佚失傳，不致有此種種後話了。但恰是其別致形式，即仿擬「英雄榜」的智巧，使得其喧傳士林^(二)。而過了大約一百年後，至清代的乾嘉時代，舒位再次運用這一形式，評論與其同時的一百多名詩人，即晚清學人「詫爲秘笈」的《乾嘉詩

「壇點將錄」。很顯然，舒位撰寫《點將錄》，是將其作為遊戲看的，故並不入集^(三)，但其中卻也不乏正經用意，因為，其書不僅是乾嘉詩壇的粗筆勾勒，其中還有不少冷雋的詩評^(三)，故學者多目為「詩文評」，而鄭重收入「詩學書目」類論著。

在《光宣詩壇點將錄序》中，汪辟疆曾評述舒《錄》云：

昔葉邵園氏早年於敗紙中得瓶水舊錄，詫為秘笈，一再刊佈。又感時異事遷，舊錄諸賢，非惟篇章散佚，取證未由，即姓氏里籍，亦難盡審。乃走廠甸，搜集乾嘉兩朝詩別集讀之，乃知比擬之工，措語之巧，真令人軒渠絕倒也。晚年發篋，葺《乾嘉詩壇點將錄詩徵》若干卷，自嘉甚至，以為可備一代藝林掌故。然則前人視為遊戲興到之作者，儻亦覘世運，徵文苑者所不能廢歟^(四)。

所謂的「徵文苑」，便有「詩史」之意在^(五)。而一九一九年，他應曹震等人敦促，有意效舒位之作而撰寫的《光宣詩壇點將錄》，固然同樣也起於文人雅興，但其中「詩史」成分大為增加；而在多年之後，汪辟疆再次修訂舊作，即在舊錄的基礎上，又作了較大的增補，體例也更加謹嚴，終使此一遊戲之作發生質變，而躋身於「詩史述作」之林。在這一意義上說，汪氏的《光宣詩壇點將錄》，是勝過舒氏的《乾嘉詩壇點將錄》的。

那麼，有何理由可以認為，「點將錄」這一形式，勝任描述一代詩壇，而適合於「詩史著述」呢？要回答這個問題，首須區分兩種「詩史」，或云「詩史」的兩種趨向，即：一，側重「嬗變」的詩史；

二，側重「分佈」的詩史。前者的主座標爲「時間」，其首要的任務，是闡明詩隨時而變的規律，即「詩史之嬗變」；而後者，則側重於空間，意在描述一代詩壇的結構，即「詩史之分佈」。前者敘述的目標，是各代的詩風，所以非得宏觀敘述，各別的詩人便非所重；後者所敘述的重心，爲具體的詩人，所注重的是「歷史橫斷面」，及此一「橫斷面」中所分佈的詩人。從詩史撰述來說，任何著述必然有所側重，同時並重的「立體敘述」，也許從來沒有過，因爲，這正如俗語所云「一張口難說兩家話」，解決的辦法，便只有：「花開兩朵，各表一枝。」即兩種「詩史」同時並存與互補。

而「點將錄」所以能爲「詩史」，便因其原是一「人物位次錄」，所以，恰能勝任描述「詩史之分佈」。同時，這樣一種「點將錄」體裁，在傳統著述的發展中，實際醞釀時間已甚久，並非一次偶然的巧合。這一形式的遠源，可以上溯至班固《古今人表》^{〔二六〕}，其以精確的表格形式，將歷代人物分爲「九品」，但因此表的作意難明，而所排人物又古今雜糅，故遭到後世史家的詬病^{〔二七〕}。但其影響卻是深遠的。如後世官制的「九品中正制」，科第中所謂的「龍虎榜」，青樓中所謂的「花榜」，書譜、畫譜的「能品」、「神品」、「逸品」等名目，以及明清白話小說的結尾，通常可見的「封神榜」、「英雄榜」、「情榜」等，實際都與班氏《人表》有關。而傳統的詩學著述，又復有鍾嶸的《詩品》，曾用此一形式，把歷代詩人作了「品第」。至唐宋時期，又有張爲的《詩人主客圖》、呂本中的《江西詩派圖》，清代有劉寶書的《詩家位業圖》^{〔二八〕}，等等，都屬於此類著述的衍變。而所有這些詩學著述，雖都曾被目爲詩話，收入歷代詩話類叢書，但其實並非「詩話之變相」，而是一種「詩人位次錄」，或說一種

「分佈詩史」的雛形。同時，又因此類著述中，都不免帶有文人雅興，篇幅也往往不大，尚不足描述「分佈詩史」，所以，其在批評史上的影響，固然也不算小，卻都還難以同汪氏此《錄》相比。

三

汪《錄》較諸舒《錄》，不僅篇幅增加，而且體例更爲完善，亦以此故，此一體裁，遂始可稱之爲詩史。茲分九事詳述之。

舒《錄》原有位次，即一百零八人數，大概爲便於點將，而沿《東林點將錄》之例，於位次並未悉遵原著，故多有與「英雄榜」不符處。汪《錄》的位次排列，一依《水滸傳》原作，頭領座次、名稱、星名諱號，及所任山寨之職等，均無違改處。這就減少了隨意成分。此其一。

《東林點將錄》的位次數目，與《水滸傳》「英雄榜」同，僅一百零八人，舒《錄》增加一位，即「黃面佛」（按原不列於英雄榜），用與深研佛學的彭紹升相配。汪《錄》亦保留此位，用配有「詩僧第一」之號的釋敬安，更爲說明晚清詩史淵源，復增設「教頭王進」一位（按原亦不在英雄榜），用與影響近代詩風甚巨的鄭珍相配，使「詩史」於結構上更趨完整。此其二。

較之《東林點將錄》，舒《錄》的體例，有一重要發明，即增出「一作」之例。換言之，即是一位可配二人。需要說明，「一作」之人，其詩的功力造詣，與居正位者應相當，或風格淵源有近似處，而

其名望則稍有不逮。此一體例的意義，在於增多入錄人數，而舒《錄》所收人數，遂亦由一百零八位增至一百五十二位。汪《錄》也沿用之，且於此基礎上更有增進，即舒《錄》的「一作」，通例是僅附一人，而汪《錄》的「一作」，則為可同時附多人。並且，汪《錄》又創為「附及」之例，正位一人之後，又復能「附見」數人。此「一作」與「附及」，視其重要程度，而加以區別：如非特別重要，而又與正位關係密切，如正位之嫡派弟子或私淑傳人，詩又未能自成家數者，則往往入「附及」，若是較重要之人，則列為「一作」。有此一新增體例，汪《錄》的篇幅，遂再一次增大，所收詩人之數，竟至一百九十二人，幾為《東林錄》的一倍，而實際所增之人，亦為舒《錄》的四分之一（二九）。撰述詩史遂具足夠的篇幅。此其三。

舒《錄》所列詩人，每有冷雋的贊語，不過，其贊多是品第其人，甚至及於水泊頭領，而於詩人詩作之評泊，頗嫌其少，詩學意義故不多。汪《錄》亦仍其舊，增至每人一贊，或述其人，或評其詩，或亦及頭領、名號。如單贊詩人，陳衍、林旭、樊增祥等是；僅及山寨頭領，徐寧、楊增榮等是；而其中的大部分，則語出雙關，妙為縮合。所以，觀其文則富機趣，究其實則為詩史，「點將錄」遂亦為一種絕妙體裁。此其四。

舒《錄》詩人小傳，所載俱極簡單，多屬開列字號、籍貫、官履等。汪《錄》初稿無小傳，定稿增撰補人，因其為未完之稿，故亦頗嫌簡略，而所缺的也不在少。據程千帆《汪辟疆文集後記》稱，汪曾接受李宜龔的建議，撰寫過較詳的詩人傳略⁽¹⁰⁾，其部分即為《光宣詩人小傳稿》。於此可見其

結撰的嚴肅態度。此其五。

汪《錄》還新增論詩詩。贊爲每家所必有，論詩詩則或有或無，視具體情況而定。據我的統計，論詩詩凡六十二首，自撰絕句五十七首，援引他人者五首。所有這些論詩詩，大多涉及光宣詩壇軼聞，如論楊增舉一首云：「都官正字無偏嗜，始信多師是汝師。」即指楊與夏敬觀爲梅詩而起爭執事^(三)。順帶而及於評騭的，如論梁鼎芬、柯劭忞等數首^(三)；舉及詩人名篇佳句的，如論俞明震、陳詩等數首^(三)。亦以此故，品評詩人，遂蠲去單一化之弊，而有了較多的角度。此其六。

汪《錄》又增詩評。此一部分，爲汪《錄》之爲「詩史」，提供了充足的内容。因爲，無論是贊語，抑或是論詩絕句，都或多或少會受體裁局限，於達意不免折扣^(四)，而難以擔當批評的任務。而散文的體裁，便無此弊端。汪《錄》的詩評，是站在詩史的高度，所以，很注重綜合衆說，而尤多採用大家之評。他並不輕下雌黃，但每出一語，必有堅實的依據。此其七。

汪《錄》更添「雜記」部分，即《光宣以來詩壇旁記》，然亦爲未完之作。據程千帆《後記》說，「點將錄」於每人名下，有「贊、詩、評、雜記、小傳」^(五)，「旁記」即是「雜記」，用意是「存掌故」，而編爲「點將錄」的外篇，相輔而行。據我猜想，「雜記」的次序，揆諸著述的體例，應該在「傳略」之後，而非之前，否則便是「躐等」，恐難免學人非議了。從「雜記」之作可知，汪辟疆是極留心於史家「知人論世」的。此其八。

汪《錄》曾擬增「詩選」。據程千帆《後記》說，抗戰期間，汪辟疆擬編《點將錄詩選》，約爲六